

探幽与发微



——中国现当代文学
散点透视

石兴泽 石小寒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014036209

I206.6-53
42

探幽与发微

Tanyou Yu Fawei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

石兴泽 石小寒 著



1. 文学 - 中国 - 现当代 - 文学 - 散点透视

2. 文学 - 中国 - 现当代 - 文学 - 散点透视

3. 文学 - 中国 - 现当代 - 文学 - 散点透视

4. 文学 - 中国 - 现当代 - 文学 - 散点透视

5. 文学 - 中国 - 现当代 - 文学 - 散点透视

6. 文学 - 中国 - 现当代 - 文学 - 散点透视



北航

C1715477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I206.6-53

42

内容提要

本书汇集了作者二十年来撰写的三十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重要作家和具体作品进行了富有现实针对性的散点透视,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如社会学理论观念和方法、史料建设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媒介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浮躁时代的治学态度、《讲话》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涉及郭沫若、傅斯年、老舍、艾青、王蒙、汪曾祺、张炜、毕飞宇等众作家及某些屡被热炒或者向被冷落的作品。作者视野开阔,思维细敏,洞察深幽,观点稳健沉实,语言平实有力。本书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著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幽与发微:中国现当代文学散点透视/石兴泽,
石小寒著.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04-039263-0

I. ①探… II. ①石… ②石… III. ①中国文学—现
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
论—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3532 号

策划编辑 云慧霞
责任编辑 张小楠

责任编辑 轩红芹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封面设计 张申申

版式设计 王艳红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9263-00

人文学科发展与民族精神家园建构

(代序)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说明白的。大题小做是写文章的大忌，我自知没能力做却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涉及人文学科发展，也涉及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很希望有人来做这方面的文章。在此，我权且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与人文学科当下的处境密切相关。在物质主义盛行、经济利益至上、科学技术发达、科技理性强势的时代语境中，人文学科急需发展但实际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国家用于这方面的建设资金少得可怜，与自然科学发展基金相比，虽不能说九牛一毛，但经费缺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地方政府重经济效益而轻人文建设，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反映了人文建设在地方政府工作棋盘上的尴尬处境：文化是跑龙套、打杂的，忙活一场，恭候经济驾临。由此导致人文学科人才培养的困境和就业前景的黯淡，也造成人文学科从业人员的自我看低。学科是大学的主体建构，几乎所有教师都属于一定的学科，但很多大学用于人文学科发展的投资，无法与理、工、医等学科相比。而没有经费支持，在这个依赖经济杠杆撬动社会发展的时代，是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十二五”重点学科建设规划提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挂钩，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学科优先发展，而关系疏远的学科靠边站，无法与经济挂钩、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文学科很难在各级各类重点学科布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为了抢占学科高地，获得经费支持，人文学科的院长主任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与经济“攀亲”，甚至不惜改变学科结构、扭曲学科特点、遮蔽传统优势、拆散人才队伍、无视研究兴趣、生拉硬扯、拼接整合，严重影响了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与我们的人文现状及精神家园建设环境密切相关。市场经济是这个时代的主体特征，它促进了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也导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精神低迷，导致世俗文化泛滥和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导致全民性的精神危机的爆发，以至于出现饮食居住的安全隐患，出现马加爵、药家鑫和留学生行刺母亲事件发生，出现女大学生当二奶卖

淫等令人寒心和痛心的现象。作为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状况，知道他们读什么书，上网看什么信息，知道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多青年学生缺少健康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缺少高尚的情趣和操守，缺少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不知道珍惜青春，不知道尊严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很多令人沮丧和失望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和泛滥，一再向我们敲响警钟：一定要重视民族精神文化建设，重视人文精神提升。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非但没有出现改善的迹象，反而有继续下滑的趋势。这是令人焦虑的严峻现实，值得警惕的存在！

提升民族精神，营造健康的精神家园，改善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人文学科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强化人文学科建设对于改善人文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史证明了这一事实，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尽管发展缓慢，但文化积淀深厚，任何外来侵略都没有隔断民族历史的延续，没有出现文化断裂和民族分裂的悲剧——我们固然不能全盘肯定传统文化，忽视巨大的文化积淀对于民族个性发展的束缚，对于物质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我们也不能无视文化传统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忽视重精神轻科技、重文化轻经济的历史教训，也不能忽视因为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经济而忽视人文精神建设所导致的社会道德滑坡、精神家园荒落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落后挨打的历史屈辱，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即使在挨打的屈辱困境中也有健康的精神、高昂的民气。我们无法穷究民族精神家园为何荒落，人文精神为何出现危机，世俗文化为何泛滥，青年学生为何低迷，但几十年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证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硬道理，厚此薄彼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民族精神及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与人文学科建设弱化有关，但可以肯定地说，重视人文学科建设，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的同时，强化人文思想教育，营造健康的人文环境，给青年学生成长提供良好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资源，增强他们的精神免疫力，会避免很多很多问题。因为现在青年学生成长的环境并非健康优良，甚至很不安全。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给他们带来物质享受，也给他们增设了成长的诱惑和选择的陷阱，互联网、世俗文化、消费主义、低俗信息、感官刺激……以巨大的诱惑力吸引着他们，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面临诸多陷阱，诸多安全隐患。正如孩子家长所言：从家庭到学校，孩子上学所经之处，有多少网吧游戏诱惑着他们？而大学周围，又有多少娱乐场所等着学生们进去消费？家庭和社会都没有给他们的成长营造安全的环境，家长的娇惯和人文教育的乏力使他们无法辨别、也无力抗拒低俗诱惑。这是十分严峻的现实。

历史箴言值得铭记。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著名教育家、学者潘光旦先生反思国难与教育的关系，撰写《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其中说，近代以

来的教育有很多对不起青年和国家的亏欠，概括地说，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他分析说，中国当时的教育有三种：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宗旨在于教育受教育者识字，会读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是教人学习吃饭的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他说这种教育最“耸人听闻”，充其量就是培养专家或文官。这三种教育——识字教育、吃饭教育和文官教育，都忽视了“做人”“做士”之道的教育，忽视了对受教育者“情绪和意志”的培养。在他心目中，这才是最重要的教育。他说，国难的形成固然有其内外原因，但就其内因而言，与当时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对此，教育应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教育忽略了教育人“做人”“做士”的使命。“教育不知做人做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这是一个教育家对教育使命的深刻反思，把国难与教育“失职”联系起来，或许有些苛刻，但他所提出的教育应当重视“做人”教育、培养“士”的情志，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确实值得深思，也是具有现实警示意义的。

历史事件值得回放。1923年著名学者张君勱在清华大学发表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认为科技进步创造了物质财富，也毁坏了“人生观”，致使物欲横流，人成为物的附属品，失去精神方向，甚至认为，世界大战爆发也与此相关。而要解决“人生观”问题，抑制物欲横流的现象发生，就要回到孔孟那里，回到宋元理学那里。^[2]由此而引发了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胡适、丁文江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其所言科学发展给社会带来灾难或许有些偏颇，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罪于科学技术发达或许荒谬，抑制科学技术、提倡玄学、用儒家思想解决“人生观”和社会灾难问题也不是正确的处方，但他重视人文精神的提升却是启人深思的。90年过去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经济腾飞，物质繁荣，而人类却出现生存和精神的严重危机。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固然不能回到张君勱的思想水平线上，但我们也不能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熟视无睹。现在不少学者走到张君勱“前面”，在“国学热”及国内外儒学大会上，都有很多人径直地将儒家思想作为补救人类精神危机的文化资源。我们或许不同意某些主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思想史上的灵光一现，忽视人文精神对于抑制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建设精神家园、救治人类心灵伤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就不能不格外地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

先贤的思想值得参考。20世纪40年代，正值民族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罗家伦以高度的社会使命感撰写《新人生观》（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呼吁知识分子树立新的人生观，养成道德的勇气，负起知识的责任，发挥知识的力量，以此影响青年，恢复“丧失的自信心”；与此同时，著名作家吴组缃有感于国民抗战激情消退、国民精神低落的现实，忧心忡忡，提出多翻译些浪漫主义作品，以振兴民族精神，提升民气，为抗战注入强心剂。他对赵瑞蕻、叶君健

说：“今日人之消沉，半死不活，若期有裨世道人心，以翻译西洋浪漫主义作品最为适宜。”^[3] 这种想法有些书生气，却是很多书生们的共识；德国作家诺瓦利斯也曾试图用浪漫主义改善世俗世界，认为“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通过浪漫化，“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同一起来”。^[4]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忧国忧民之贤士持续不断地倡导，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精神滑坡的现实。这从正反两面道出一个基本事实：加强人文学科建设，对于民族精神素质的提升和精神家园的营造，确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精神家园荒落、人文精神持续下滑的当下尤其如此。人文学科是关乎心灵、关乎精神的学科，是铸造灵魂、提高素质的学科。人文学科不会制造导弹和科技软件，也无法直接促进科技进步带来经济效益，但人文学科的强弱与否，健康与否，却直接影响着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和青少年的心灵健康。作为人文工作者，我们要加强责任意识，加强自身的建设，但同时也呼吁社会重视人文学科建设，改变人文学科边缘化的尴尬现实，恢复人文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

当然，人文学科也存在自身建设的问题，存在科学而健康地发展的问题。因为许多问题的出现，尤其是青年学生人文素质的低落，固然与社会环境诱惑和科技理性强势发展有关，也与人文学科建设中所存在的价值多元而紊乱、知识信息爆炸但良莠杂陈以及人文工作者自身人文精神匮乏有关。但这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就此打住！

注释：

[1] 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政学罪言》，观察社1948年版。

[2] 张君勱：《人生观》，《清华周刊》1923年第272期。

[3] 《吴组缃日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

[4] 转引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011年5月25日在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山东大学举办的文史哲与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会议上的发言。）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目 录

上篇 综合论述 \ 1

文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3

史料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石 \ 13

儒学观念及其现代价值献惑 \ 2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当代文学 \ 26

“翻阅”武训研究的两座山 \ 34

浮躁时代期盼严谨的治学态度 \ 38

消费时代的文学呼唤浪漫主义精神 \ 47

自由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 50

影视媒介挤压下作家创作的窘境 \ 53

报告文学的欣喜与隐忧 \ 63

从聊城作家的群起把脉时代文学虚火 \ 72

中篇 作家论 \ 81

郭沫若管视 \ 83

文学家傅斯年论略 \ 94

老舍在青岛——兼论老舍的城市文化心理 \ 108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寻找阳翰笙先生 \ 115

社会变革年代艾青的追求与困顿 \ 120

杨朔别解 \ 128

汪曾祺论 \ 136

刘绍棠论 \ 148

张炜：文学家园的守护者和守望者 \ 162

卢新华印象 \ 167

郭保林散文创作论 \ 172

下篇 作品论 \ 181

孤傲落寞者的心灵投射——高长虹两部诗集解读 \ 183

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回民叙事——读老舍、宋之的作《国家至上》 \ 190

殖民统治下的痛苦呻吟——读杨逵作《送报夫》 \ 198

历史亲历者的“留言”——读《王蒙自传》 \ 204

悲壮历史的深度反思——读钱刚作《海葬》 \ 218

书写盲人生活境况和心灵世界的力作——读毕飞宇作《推拿》 \ 223

揭橥古代文人的生命密码——读郭保林作《此情不关风和月》 \ 232

知识型官员的底色和官场小说的品味——读刘伟作《拾级而上》 \ 246

直视、粉饰说“正道”——读李金龙作《正道》 \ 253

后记 \ 261

上篇 综合论述

文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所论，主要是文学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社会学理论在此特指，把文学视为社会学的组成部分，进而对其进行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史学评价的理论。理论是思想观念问题，也是思维方法问题，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发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理论影响价值标准、研究方法、切入角度，也影响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影响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和具体阐释。研究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如材料取舍、文本解读、意义阐释、内涵挖掘，以及研究成果的水平、价值和质量等，都与研究者所依据的理论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与之相关联的内容分析、审美评价和史学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很多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某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有时受到重视、得到高度评价，有时又遭受冷落、评价很低甚至完全被否定；或者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备受关注，而在另外的研究者看来不值一提；即使同一研究者，面对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段也会做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如此这般，均与所持的理论相关。因此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整理研究路途中的纷杂现象，从考察理论的角度切入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当代学术文化巨树上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形态与当代学术文化密切相关。但作为显学的当代文学研究又不是简单机械地反映当代学术文化，它在受制于当代学术文化及其发展演变的同时，又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需求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在自己的所属领域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行进，并且在行进过程中影响着时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丰富着时代学术文化的内涵。并且，其反影响力有时也很大，大到影响时代学术文化建设、甚至社会发展走向的程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些社会政治运动就是从文学论争开始，进而逐渐扩展开来，最后形成影响全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而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影响国家政治生活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从文学研究开始的。也就是说，发生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某些“文学研究”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也扩大疆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样说来，考察当代文学研究理论问题，或者说从研究理论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仅有益于认识当代文学研究自身，而且对于认识当代学术文化建设

及其致因机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理论,不仅要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进行梳理,而且要顾及当代学术文化,将其置于当代学术文化建设的大环境中来认识。这样一来就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但离开大环境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因此,我们删繁就简,紧扣理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个中心议题行文,只在必要时涉及学术文化背景。研究理论形态各异,在此我们仅就影响较大、较为普遍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做些简略的考察。

一、文学社会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因而被广泛运用

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上看,文学社会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它是众多从理论形态的高度对文学的属性和功能进行定位和阐释的一种。作为一种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制约甚至决定着研究者的思维方法、价值取向、切入角度等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按照这一理论,文学是复杂的社会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发展、变化及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均受制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变化虽然不一定是顺应对应的,却是密切相关、呼应有据的。社会学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属性及其功能,按照这一理论规限,无论考察文学思潮、解释文学现象及其制因机制,还是作家研究、文本分析,均与特定的社会构成联系起来,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各种文学现象,分析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价值意义。概略地说,社会学的文学研究比较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创作实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曾表现出巨大的理论优势。胡适、傅斯年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倡导文学革命,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说明文言之当废、白话之当兴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显示出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对推动文学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文学革新申义》是文学革命倡导期一篇重要的文章,傅斯年“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说明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都是“群类精神”的组成部分,系统地阐述文学随着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晚周有晚周特有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有南朝特殊之政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学。降及后代,莫不如此。此理至明矣也。”^[2]鲁迅则认为“各种文学,都适应环境而产生的”^[3],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魏初文章的风格,说因为曹操“尚刑名”,立法严格,“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其时的另一特点“尚通脱”,“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4]鲁迅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分析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对各种小说

现象都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在谈到清末谴责小说时更是精辟地指出：“光绪庚子（一九零零）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5]这种分析具有经典意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文学社会学理论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集体自觉。

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理论的要义，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能准确地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纷杂的文学现象，像鲁迅那样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准确的社会学阐释的不占多数。文学社会学理论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可、都接受、都能运用和愿意运用的。因为文学社会学无论作为理论观念还是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都不流行，在庞杂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中国古代不重视文学，也不重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被视为“雕虫小技”，从业者往往从文学本身如字义演变、文体变化、文本叙事与历史本事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广泛流行的是注释评点、考据索隐、训诂学。曹顺庆著文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曾提到“考证与注疏”“选本与摘句”“品第与流别”“指瑕与才略”“语录与诗话”以及“评点”等^[6]，这些研究虽然不乏合理性，也出现了很多学问家及辉煌著述，但研究者的眼光局限于狭窄的视阈，着重于文本的细微末节，即使涉及文本与社会的关系，也往往由考据流于索隐，由索隐偏于比附，如解释清末谴责小说就把某部小说的某些描写与某人某事联系起来，说某段文字影射的是某人某事。如《红楼梦》研究中有“旧红学派”，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一比附，说某个人物影射某某。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说贾宝玉影射胤初，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7]清末民初的王梦元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一书中说，《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也有研究者从字里行间揣度微言大义，从细微末节考索作者的形象和家世，花费心血考证贾宝玉的原型及其身材相貌、有无胡须等。上述现象主要发生在文学社会学理论没被引介和认可的古代和近代，姑且不论；在此要说的是，即使在文学社会学理论被突出强调和广泛运用的现当代，某些具有现代知识背景的学者，也远离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重走考据、索隐的治学老路，根据不可靠或者暂时难以论定的史料进行推断，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老一辈学者如俞平伯、周汝昌

且不说，他们在旧的学术文化传统和胡适的实证主义理论影响下走上研究“红学”之路，由索引、考据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走不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光影，情有可原；刘心武是在文学社会学理论大普及之后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表明，他因袭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的“探佚学中的考据派”实属于旧索隐派一族。他创造了“秦学”，提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的女儿的观点，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百家讲堂》上说，薛宝钗性情的改变与选秀失败有关，因为薛宝钗进京的目的是为选秀。^[6] 这些研究不仅剑走偏锋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疏离了审美分析和内涵挖掘，对文学研究和学术文化发展都缺乏足够的意义。旧“红学”在社会学理论开始普及的时候曾经受到批判，时隔几十年，刘心武重返旧路，这是耐人寻味的反弹。既说明考据派、索隐派治学传统深入中国学人之心，影响持久，也说明社会学理论对于科学的文学研究确有深刻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使很多文学现象得到合乎逻辑的说明，使很多文本的思想内涵得到切合实际的阐释。文学史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型项目，很能说明文学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在文学史写作中，几乎所有的史家对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给予社会学阐释，或者说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框架之中进行阐释，这几乎成为一种写作定势，成为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和“文学运动”就将其置于共和国刚刚成立、政权需要巩固、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上，分析“斗争”和“运动”的不可避免性；分析“大跃进”民歌则将其置于全民“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中，说明“大跃进”民歌的发生发展及其对中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的真实反映；分析60年代初历史剧创作的大量涌现，便将其置于那时代的天灾人祸降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民气需要鼓舞这一背景中，说明众多历史剧是怎样体现了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分析随后出现的阶级斗争文学则把它们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关联在一起，说明这一创作现象的出现有广阔的社会背景，而作家的创作也因此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作品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分析“文化大革命”文学自然把它置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说明文学枯寂是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在诸如此类的文学史书写中，文学是感应器，敏锐地感应着社会变革的节奏；是镜子，迅捷地映照出历史发展的事态和命相；是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发展；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随着社会机器的高速运转而发展变化。总之，文学的社会学属性得到充分表现！

文学社会学理论不仅在文学史写作中被广泛运用，而且在作家作品分析中也十分流行，并且形成套路和程式——首先分析作品的社会背景，说明写作原

因，为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做出铺垫；然后分析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对照当时的社会现实说明情节和人物的历史合理性；最后总结主题思想，在与社会发展联系中说明主题倾向的社会意义。如分析《在新事物面前》，结合新旧交替的中国现实分析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及其意义，指出《在新事物面前》“及时而敏感地向我们的干部提出怎样面对新形势、接受新事物、领导好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问题”，进而得出这是“一个紧紧跟随生活脚步、迅速反映我国从解放战争进入和平建设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工业战线生活和斗争的剧作”，作品主要人物薛志刚是一个“踏着时代的节拍走在生活前头的战士”；而分析夏衍的《考验》则从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说到官僚主义作风，进而指出，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在《考验》中严肃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⑨，以彰显作品的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在此类研究中，社会背景成为作品解读的重要参照，甚至是重要的价值尺度。对于某些“背景”明显的作品，则以“时代特色鲜明”予以肯定，而对于某些“背景”不甚清晰的作品，则要通过蛛丝马迹挖掘“背景”线索，使之清晰，然后结合社会背景对作品“说三道四”：对于被认为优秀的作品，倘若背景模糊，搜寻不出蛛丝马迹，就说明作品“背景”隐蔽是艺术性的表现；倘若认为作品不怎么样，或者说要贬低某部作品，则“背景”不清晰便是一个有力的依据，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要指出，作品因背景不清晰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作品的缺憾所在。如《骆驼祥子》的故事“背景”并不清晰，20年代还是30年代？阐释者首先做足做好这方面的文章，根据各种线索故事进行推测，而在各种推测中，祥子第一次丢车的时间这原本不重要的描写就成为一个重要线索，研究者费尽心思考证其写的是哪一次战争，以此推断祥子入城的年代，推断作品故事发生的年代。“年代”（即背景）确定后，再对照军阀混战的历史事实分析作品内容及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对作品的社会意义进行判断。

文学社会学理论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学的联系，对于强化文学的社会内涵、促使作家从社会层面把握社会、思考人生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促使文学研究走出狭窄的考据学思路，走上宽阔的社会学研究道路，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文学社会学带有局限性，简单化运用给创作和研究带来严重影响

文学社会学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因为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复杂的存在，不仅有鲜明的社会学内容，还有丰富的非社会学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行为处事、生活态度、情感立场、思想倾向等，既受社会学诸因素的